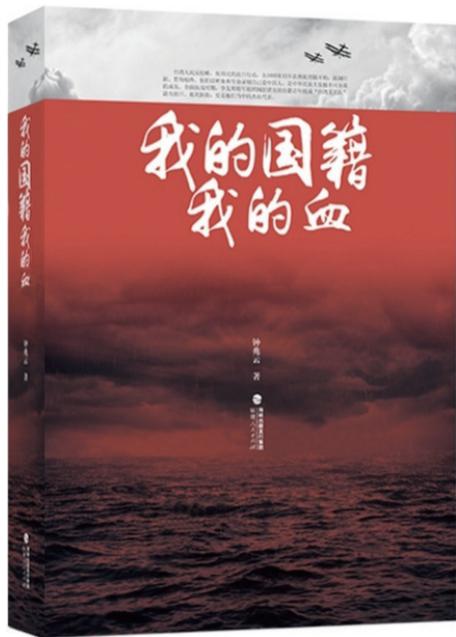


历史构建下的责任担当



《我的国籍我的血》
钟兆云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作家钟兆云的新著《我的国籍我的血》，用有血有肉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复活了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并肩抗日的一段历史。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一批台胞奔赴大陆投身抗日。“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代表的台胞抗日青年发出了这样的呼喊。1939年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队长兼团长，晋阶陆军少将。具有正规

军编制的台湾义勇队将士转战浙皖闽各省，移驻闽西龙岩、闽南漳州、厦门，深入前线后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工作。抗战期间，至少有5万名台胞奔赴大陆投身抗日，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是其中最杰出代表。

小说以这段真实历史为蓝本，在不损害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进行适度虚构，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争取民族自由、追求人类正义的抗战史诗。日本殖民台湾时，小说主人公李友邦

被剥夺了国籍，成为“亚细亚的孤儿”，他为了恢复自己的国籍，在祖国大陆的土地上发出了生命的呐喊：以我的血，还我的国籍。

今天的小说读者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那类如饥似渴的读者了，今天的读者都是信息的“饱汉子”，要想征服他们，小说就应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小说的吸引力是当前小说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而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小说，吸引力欠缺，甚至难以卒读。值得肯定的是，钟兆云的这部《我的国籍我的血》是一部吸引力十足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吸引力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故事节奏恰到好处。情节推进该快时快，该慢时慢，把控得当。尤其是开篇，情节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很是引人入胜，一口气读下来，酣畅淋漓。一艘船穿越海峡，来到福州三坊七巷，小说涉及的人物悉数登场，故事的大幕拉开，就等大戏上演了。二是小说信息量大。为了避免情节单一、单调，钟兆云虚构了另一条线索——医生郑中原一家的故事，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抗战英雄李友邦将军的故事融为一体，这样，小说的信息量就变得丰富起来，让艰苦残酷的抗日史实有了柔软的情感故事，小说的阐释空间也大起来。三是把人物写“活”了。小说除了成功地塑造了真实的李友邦、严秀峰等人物形象外，还写“活”了一批虚构的人物，比如郑中原、郑华美等。整部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到上百人，有的虽然只有几笔，也是颇有神韵。

好小说不必在乎题材大小，但应将小说置于大背景中；好小说不必在乎人物的大小，但应写出人物的命运感。《我的国籍我的血》写的是一段历史大背景中的人物，小说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另外这部小说写出了李友

邦、郑华美等人半生漂泊的命运感。这部小说的吸引力在于：一个大背景，一群大小人物，为了自由和正义，谱写了生命和命运的华章。

此外，这部小说有较强的感染力，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命运，能将读者带入那段颠沛流离的历史中，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为故事紧张，为人物牵挂。小说的这种感染力来源于小说人物的多重身份、多重民族情感的交替。

小说至少写了三重情感。一重情感——乡愁。李友邦、郑中原、郑华美等主人公来自台湾，有台湾的原乡情感认同，中国是他们的祖国，台湾是他们的家乡，乡愁浓烈，最后他们都回到了台湾，了却乡愁。二重情感——国恨。台湾被日本殖民，台湾人被逼成为日籍台湾人，他们都有对日本殖民者的憎恨。三重情感——祖国认同。他们来到大陆抗日，有认祖归宗的渴望，但又不是中国籍，有时不受待见，在夹缝中渴望恢复中国籍。

小说写的是那段时序混乱的国仇家恨的历史，这批人物身在大陆——辗转于福建浙江等地，憎恨在台湾的日本人，心属祖国大陆，身份可谓复杂，加之身处之地的政治文化复杂，日本浪人、特务、国民政府、共产党人等交织在一起，小说的复杂性让小说有了丰富的感染力。

《我的国籍我的血》在小说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的有机融合上做了有意义的探索，艺术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处理恰当，合二为一。小说如何写历史？如何写出历史的骨的同时写出人的血肉？人的虚构与史的真实之间如何交融在一起？对这些问题，钟兆云的这部小说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来源：新华读书）



《与废墟为伴》
作者：玛丽莲·约翰逊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以废墟遗迹引导考古学前沿，史学紧跟寻找独特答案，既将丰厚的古典遗产激活在旧城故都中，又将绵长的精神遗泽塑造成一部人类的文明史。本书启发人们重拾对历史造物的信仰与谦卑，面向世界运用考古成果对话多元文明。



《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
作者：程维 柳青 张晓峰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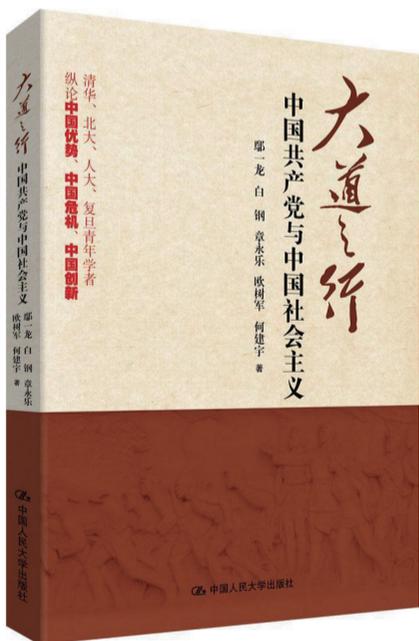
本书全方位地解析滴滴的发展之路，生动地向读者展现滴滴在短短四年中，如何从0到1，找到一条独特的智慧出行分享经济之路，进而成为世界级分享经济平台。除却用客观真实的数据，滴滴高管更是现身说法，用自己平实的语言展示滴滴走过的路，用虔诚的心讲述滴滴人自己的故事，和读者、和社会、和未来对话。



《安琪拉的灰烬》
作者：弗兰克·迈考特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当我回首童年，我总奇怪自己竟然活了下来。”美国著名作家、杰出教师弗兰克·迈考特以独具特色的轻快笔调，讲述自己在爱尔兰贫民窟的真实成长经历。然而面对苦难，他没有放弃希望，最终通过努力攒够了去美国寻梦的路费，踏上了新的征程。

一本严肃的理论著作为何畅销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郗一龙 白钢 章永乐 欧树军 何建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道之行》的五位作者郗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以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不同角度聚焦“中国问题”，剖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不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还结合中华文明传统，对以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在现代中国生发并茁壮成长的原因，作了尝试性解答，别开生面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华文明传统的内在关联。

与传统党建理论不同，作者们还富有创见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人

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不依托寄望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能让亿万人民信奉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取任何宗教之名相，一方面却能现实地承担起宗教之功能，即对有意义的生活何以可能、生命之终极意义何在之类的宗教性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从而点出了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尊崇唯物论与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

践中，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充当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并体现在各条战线各个年龄段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事迹中，引领着社会风尚。作者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一思想贡献形之于文字的最好代表，便是毛泽东所著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站在文明史的高度，作者们还探讨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者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国要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更深度地嵌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甚而成为对于这一体系的维系力量。这确实是巨大的历史悖论。突破这一悖论的核心，则是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作用或博弈过程视为动态的、相互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能于一国建成，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存、不断受到资本主义逻辑影响的过程中，如何以依自不依他的高度自觉与强大定力始终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建设之根本，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领导核心的政党的主体性建设。”这确实是富有辩证思维和主体思维的深刻见解。

中国政治制度从总体上看是优越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制度保障，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不需要改革和调整的。中国政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中国在国家层面虽然有很大的“自主性”，但整个党政体系在“先进性”与“代表性”方面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与之相关联的是第二点：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信息化，使得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诉求大大提升，但中国政治体

制在授权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最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意识形态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结合仍不够紧密，“好干部”的政治标准仍有不少模糊之处。书中以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态度直面以上矛盾和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党员干部言行与意识形态表述表里不一的危害，探讨了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出以评议式民主而非选举式民主满足群众的政治参与需求，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结合。

作者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中国基层的变局给予了高度关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和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商品交换的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一系列社会乱象。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危机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高度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作者们强烈呼吁“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再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以应对日趋严重的基层乱象。这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富有建设性，既体现了尊重劳动人民主体地位的群众情怀，又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和精神。

总之，这是一部散发着强烈的实践情怀和问题意识的著作，以掷地有声、新鲜朴实的话语探讨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其思考和答案或有不完备或不成熟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书中提出的许多创见值得广大共产党人深思。（来源：新华读书）